

Winter 2011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December No.15

2011年12月 第十五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15期
2011年12月

主编 郭棣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金德水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b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nren Davaa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棣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于2011年11月4日至6日在京召开。



P.08

→ 由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成都传媒集团承办、亚洲城市联盟鼎力支持的“第九届亚洲传媒论坛暨第三届亚洲城市论坛”于2011年11月25日在成都召开。

特稿

- 02 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圆满落幕
- 06 图们江学术论坛2011暨第五届卧龙学术奖颁奖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
- 08 第九届亚洲传媒论坛暨第三届亚洲城市论坛在成都召开
- 10 “国际儒学论坛·2011”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学术活动

- 12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举办“比较视角下的东亚地区研究”与“二战后日本家庭关系的社会学分析”学术讲座
- 13 缅甸问题专家贺圣达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 14 “友好·合作·发展——中东剧变下的中阿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研究进展

- 15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 20 世界汉外双语词典史的缘起
- 27 问题与视角:西方易学的三种研究路径

研究机构

- 35 新西兰南亚研究中心

赴韩学者交流

- 36 怀着一颗心去,带着一份情回——赴韩访学一年后记



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圆满落幕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于2011年11月4日至6日在京召开。

11月4日上午，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中国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凤桐，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获得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牛津大学前校长、大英图书馆前主席克林·卢卡斯（Colin Lucas）、韩国

SK集团首席副董事长崔再源（Chey Jae Won），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黛琳（Renata Lok-Dessallien）、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Park In-kook）等国内外嘉宾出席了本届北京论坛。来自韩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肯尼亚等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应邀出席了北京论坛开幕式。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主持开幕式，他首先代表本届论坛组委会对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指导与支持表示感谢，向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介绍，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为主题，力求从历史演进、经济增长、



艺术传统、城市转型、教育创新多个角度来探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变革与转型的方式。他强调：“我们深知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探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人类的不懈努力，更需要我们学术界同仁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贡献，相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类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分别为本届论坛录制视频致辞。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致辞中指出，北京论坛自2004年举办以来，一直保持着鲜明的特色，在国际大背景下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主题。郝平着重强调教育是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交流融合的主要途径，是推

进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的基础，北京论坛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教育部将继续积极支持以北京论坛为代表的高端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希望与会嘉宾一起为实现世界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目标携手努力。

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凤桐在讲话中谈到了北京论坛对北京市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意义。他提到，一个城市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其文化上的内涵。北京论坛在北京市的举办，不仅有助于提升北京市的文化内涵，还有助于加强北京市与其他城市的交流合作，进而提高北京市的国际影响力。此次北京论坛的城市分论坛专门探讨城市化的过去和未来，力求探寻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方向与出路，即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的转型以及如何转型中发现和延续传统中的优良价值。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代表韩国 SK 集团崔泰源董事长致辞。崔泰源在致辞中说，今年论坛探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实际上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社会能否同时是现代化社会的问题；二是现代社会能否保持其传统的问题。最后，崔泰源以中国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词结束致辞，表达了对北京论坛进一步汇聚全世界力量和智慧推动社会发展的期望。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在致辞中向出席北京论坛的领导、嘉宾、学者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感谢各界人士一直以来对北京论坛的大力支持。他说，在北京论坛的视野中，传统从来不是静止和僵化的元素，它随着当代人每一次的回溯与重构焕发出新的魅力。传统也是相当丰富和多元的，我们拥有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轨迹，也拥有古典和近代的思想成果，所有的传

统都将在以下的愿景中得到重新阐发：人与人之间如何能更为平等，人与社会之间如何能更为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如何能更为包容和互惠。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罗伯特·贝拉、罗杰·梅尔森、克林·卢卡斯和林毅夫四位国际知名学者分别作了题为《骤变与不变：爆炸式发展与永恒真理》、《理解政府机制的基础：领导力、法制和地方政府》、《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大学的作用》和《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精彩报告。

11月6日上午，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论坛（2011）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落下帷幕。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大英图书馆前主席克林·卢卡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郑萼等校外嘉宾，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等校领导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主持。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郑萼女士分别在闭幕式上致辞。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在总结讲话中提到，北京论坛自2004年举办至今，八年来共邀请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700名学者与会，收到了超过1800份学术论文，取得了丰硕成果。朴仁国总长对与会学者积极讨论的活跃气氛表示赞赏。他强调了北京论坛的重要性，认为论坛对探讨“世界和谐与平衡、东西方关系、成功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每届的北京论坛之夜专场音乐演出则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展望未来，他指出人类需要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方面继续合作，“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群策群力”而“贫困、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也要求我们给予更多注意”。随后，他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在本届论



坛的举办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对论坛秘书处、志愿者和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了赞赏。

在为期两天半的时间里，与会代表围绕“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充分的研讨。本届论坛共设有七个分论坛、一个青年学生论坛、一个圆桌会议、一个专场和两场对话，分别以“变与常：关于社会转型方式的历史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机遇、挑战和方向”、“教育传承与创新”、“变革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与挑战”、“艺术传统与文化创新”、“城市转型与人类未来”、“协商民主与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青年的责任与行动”、“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入世十年之发展”、“民办教育与公共财政”、“世界格局变化中的国家发展与文化复兴”、“轴心文明的对话”为研讨主题。

本届北京论坛的主题确定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具有重大而又积极的现实意义。随着对现代化进程的体验和研渐趋成熟，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入

反思，人类开始认识到现代化的双重性——即在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无节制地求多求快的社会增长方式、资源的过度滥用、世界性的环境生态危机，以及由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失范、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此语境下，人类又开始重新反思传统，关注传统的延续性和现实价值，传统的内在价值日渐彰显，传统与现代之间继承与变革的建设性关系开始逐步稳定地建立起来。文明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传统，人类社会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角力中展开继承与变革，在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和转型中实现着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化的关键阶段，变革和转型已经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场变革不仅仅意味着各国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转型，同时也将关涉到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图们江学术论坛2011暨第五届卧龙学术奖颁奖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



2011年8月21日上午,由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图们江学术论坛(2011)在白山大厦开幕。来自国内、台湾地区及朝鲜、韩国、日本、蒙古等国家的近90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东北亚地区的和谐共存与繁荣发展。

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清华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朝鲜社会科学院学者孔明星(音)、韩国高丽大学理事长金贞培(音)及日本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正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延边大学副校长、亚洲研究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朴永浩主持开幕式。

金柄珉在致辞中表示,图们江学术论坛在延边大学和论坛组委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邀请了东北亚各国专家和学者,就这一区域的文化交流兼容与发展、多元共存与对话、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面临的问题等,进行

了广泛、多维、深入的探讨。论坛以“多元共存与边缘的选择”为主题,每届设立不同分论坛,探讨如何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发掘图们江地区多元文化的独特价值,使其在文化普遍价值构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为促进东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国内外学者围绕论坛议题所展开的探讨,将成为有益图们江区域发展和进步的箴言良策。

随后,吉林大学朱显平教授、日本学者三村光弘、朝鲜学者孔明星(音)、韩国学者崔秉宇、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方浩范教授等分别作了主题报告。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报告、分论坛、公开讨论等形式,就“边缘视野下的多元文化:边界·流动·融合”、“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协调·治理·应对”两个分论题进行了探讨。

8月22日下午,图们江学术论坛圆满闭幕。

朴永浩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表示，图们江学术论坛作为高层次学术会议，一方面显示出它的“图们江”特色和功能，即以图们江地区丰富的多元文化底蕴为依托，以多元文化共存和边缘地区发展战略等问题作为观察和交流的基点；另一方面，它从学术角度，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探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谐交融、共同繁荣的道路，使得图们江论坛自举办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以学术和文化为中心的国际性论坛，图们江论坛始终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平台，让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在文化、经济方面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共享一个表达、对话、交流的场所，为共同探求图们江区域各个国家、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图们江论坛一以贯之的宗旨：促进图们江区域之间的发展进步、互助合作，并最终为这一区域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日下午，第五届卧龙学术奖颁奖仪式举行。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副校长朴永浩，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康泰硕及获奖学者出席了颁奖仪式。仪式由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全莹主持。

金柄珉在仪式上致辞。他深情地回顾了历届获得卧龙学术奖的优秀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这些学者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从事朝鲜语言、文学、历史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业绩斐然，成为这一领域研究者的典范。金柄



珉希望，广大青年学者要以历届卧龙学术奖获得者为榜样，潜心研究，早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

延边大学社科处处长朴灿奎介绍了第五届卧龙学术奖的评奖过程、获奖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学术成果及其在朝鲜族文学、朝鲜族历史、朝鲜语语言等研究方面的贡献。

随后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副校长朴永浩等为获奖学者颁奖。金东勋、孙春日、金基石分别在颁奖仪式上发表感言，回顾了从事韩国学相关研究的历程，对辛勤培养他们的母校及各位师长表达了由衷的谢意。退休教授金东勋、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孙春日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金基石教授获得本届卧龙学奖。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第九届亚洲传媒论坛暨第三届亚洲城市论坛在成都召开



由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成都传媒集团承办，亚洲城市联盟鼎力支持的“第九届亚洲传媒论坛暨第三届亚洲城市论坛”于2011年11月25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国际传媒集团的领袖、世界发达城市的城市形象推广部门负责人、传媒领域与城市品牌领域的专家学者等60余人积聚成都，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传媒与城市”，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金德龙，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华章，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川主持。英国经济学家、“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成都传媒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何冰分别作了精彩的主旨报告。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媒与城市”，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国际传媒集团的区域发展战略”、“传媒让城市更美好”、“城市形象的海外传播”四个分议题展开研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与创新重点研究中心研究员迈克尔·基恩、韩国庆南城市规划组织会长许正道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分别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凤凰卫视资深副总裁余统浩、湖南广播电视集团执行副总编盛伯骥、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等传媒领袖，畅谈了国际传媒集团的区域发展战略；《纽约我爱你》制片人艾曼纽尔·邦比、上海世博会官方电影《城市之光》总导演周亚平、纪录片《中国交响诗》导演郑浩



朴仁国



约翰·霍金斯



苏志武



丁俊杰

等著名电影人共同探讨了传媒让城市更美好的议题；联合国特许城市规划师贝琳达·袁、欧洲市场营销季刊副主编查尔斯·丹尼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文春英就城市形象的海外传播进行了广泛交流。

亚洲传媒论坛创办于2002年，是由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承办的高端性国际性传媒论坛。自创办以来，亚洲传媒论坛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九届，成为亚洲传媒界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论坛每年都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传媒领袖、知名学者、业界精英，就相关的年度热点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经过九年的不懈努力，亚洲传媒论坛已被打造成具有高知名度和号召力的论坛品牌，成为传媒领袖、业界精英共商发展大计的开放性

合作平台，传媒学者共求学术创新的前沿论坛，多元化思想碰撞与交锋的学术交流平台。亚洲传媒论坛为构建亚洲传媒研究的资源网络，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迄今为止，亚洲传媒论坛已经累计邀请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政府机构领导人、传媒领袖、知名学者和业界精英参加，有1000多家中外媒体以各种形式报道过亚洲传媒论坛。

如今，亚洲传媒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以传媒、传播为核心的综合性论坛品牌，为学界交流亚洲传媒的研究经验提供高端平台，同时为业界开拓亚洲市场提供顶尖智力和公关支持。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国际儒学论坛·2011”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2011年12月3日至4日，为期两天的第八届“国际儒学论坛·2011”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体会古人智慧，探寻儒家思想的修身处世之道。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7篇。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贺耀敏、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部部长康泰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河北省儒教研究会副会长高士涛等嘉宾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贺耀敏受副校长杨慧林委托致开幕辞。贺耀敏教授首先回忆了汤恩佳先生为人民大学捐赠孔子像的往事。随后他代表人民大学对与会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并就此次研讨会主题展开了阐述。他认为当前我国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出现了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情况。中央最近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文化问题，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意义重大。因此文化工作者要弘扬传统

文化，向古人借智慧。本届国际儒学论坛以“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为主题，体现了与会学者很强的现实追求和人文关怀。今天重新提倡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有三个意义：第一，有益于提高道德修养；第二，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风尚；第三，有利于今天的廉政建设。最后，贺耀敏教授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与会学者身体健康。

汤恩佳院长在致辞中回顾了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包括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要求，以此表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对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性，汤院长认为弘扬孔子儒家伦理思想应当受到世人的重视。随后汤院长提出要进行儒家的道德教育，提高对儒家五伦理念的认识。他对儒家五伦谈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阐述了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认为只有通过这些路径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安宁。最后汤院长说，儒家思想有五大功能：第一，能促进世界和平；第二，能提升全人类道德素质；第三，是中国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精神轴心；第四，能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第五，能达致世界各宗教文化平起平坐。

西原春夫教授在致辞中谈到他从参加第一届论坛直至今日从未缺席，他对论坛的长期坚持表示由衷的高兴。随后他讲到日本福山大地震和不久前不丹国王旺楚克和新婚王妃访日的事情。以这两件事为契机，西原春夫教授对西方的发展模式作出了反省和批判。他认为，或许亚

洲的世界观才是亚洲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真正在世界中发挥作用、拯救人类的道路。这种亚洲模式包含了许多儒学所阐述的伦理标准，因此要大力倡导发展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优秀的思想体系，他希望与会者能认真思考关于这次主题论坛的问题意识。

张立文院长在致辞中首先欢迎参会的国内外朋友，并感谢西原春夫教授以 80 高龄再次与会。随后他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维度来阐释儒家的修身：第一，从个人的维度来讲，应以“诚意、正身”作为起点，从“敬”字切入修身，提倡传统道德修养；第二，从国家的维度来讲，应以“治平”为本切入修身，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第三，从民族的纬度来讲，从“和平”、“和合”来切入修身，通达世界的大道。最后他指出，民族的责任和希望在各位学者身上、在年轻人的身上。因此，学者应该走出书斋、科研院所，走进社会，推广儒家思想，真正做到推己及人，从而有益社会。

本次论坛分设四组会议，展开五轮十八场讨论。与会代表围绕“儒家思想传统”、“儒家修身理论”、“儒家精神追求”以及“儒家政治哲学”四个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国际儒学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国际儒学论坛自 2004 年举办第一届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七届，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儒学盛会，本次会议是第八届。论坛一直把研究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题，致力于推动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和交流。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举办 “比较视角下的东亚地区研究”与 “二战后日本家庭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学术讲座

2011年10月19日下午，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邀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系访问学者曹三相先生与日本明治大学情报交流系副教授、大阪府立大学博士施利平女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作了精彩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宗锋主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亚非学院韩语系金京善教授出席了讲座。

讲座分两场进行。在第一场题为“Region-Building in Europe and Northeast Asia: Critical Juncture, Ideas and Interests”的讲座中，曹三相博士介绍了地区整合研究的意义，对比分析了当前东北亚地区整合与早期欧洲地区整合在演进过程、地区整合模式与地区整合类型等方面的异同，着重阐释了诸如“时机、观念、利益”等因素在区域融合、地区整合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曹三相博士的演讲视角独特，引人深思，听众受益良多。在第二场题为“二战后日本的家庭·亲属关系的持续和变化”讲座中，施利平副教授围绕二战后日本的亲子·亲族关系的持续和变化轨迹，分析了日本家族社会学的两个主要假说，探讨了当前日本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其形成因素。施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了多



项调查数据，使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最后，两位主讲者分别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就讲座相关话题展开探讨，交换了看法与观点。

本次讲座由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日研中心、国际关系学院、亚非学院、日语系等院系的师生参加了讲座。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缅甸问题专家贺圣达教授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2011年11月17日、18日，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客座教授、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贺圣达教授为北外师生作了题为“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和“当前缅甸政治经济形势及演变趋势”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亚非学院、教务处和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共同主办。

在题为“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讲座中，贺教授以一种宏观的视角，从东南亚历史文化的分期、进程、特点和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在题为“当前缅甸政治经济形势及演变趋势”的讲座中，贺教授从三个方面对缅甸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演变趋势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他从缅甸国情的基本特点入手，通过分析地缘上、经济上、政治上、民族关系上、对外关系上的诸多

特点，探讨了影响缅甸形势发展的各大要素。学生们就泰缅关系、欧盟与缅甸关系、缅甸民族问题、湄公河安全、缅甸民间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诸多问题与贺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贺圣达教授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及《剑桥东南亚史》中文版组译、总校审。贺圣达教授长期从事南亚研究，主要研究缅甸历史和现状、东南亚历史、当代东南亚政治与经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问题，著有《缅甸史》、《当代缅甸》、《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走向21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世纪之交的东盟与中国》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孙晓萌

“友好·合作·发展 ——中东剧变下的中阿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1年11月19日—20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举办的“友好·合作·发展——中东剧变下的中阿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来自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建设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伊斯兰经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以及也门、巴勒斯坦等国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外交部原副部长杨福昌、中国首任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出席了开幕式。北京外国语大学陈雨露校长在致辞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对外交流合作尤其是中阿交流合作的新思路，鼓励阿语系把研讨会办成中阿高水平学者交流思想和学术成果的平台，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前沿学术研究品牌。

原中国驻阿联酋、约旦大使刘宝莱先生作了题为“2011年中东局势的几个看点”的主旨发言，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齐前进先生作了题为“中东剧变与中阿关系”的主旨发言。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就中阿政治经贸、中阿语言文学和中阿社会文化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在政治经贸组中，中东剧变的原因、中东未来走向以及剧变对中国经济影响、中阿人文交流等成为专家讨论的热点；在语言文学组中，与会专家学者对新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小说和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社会文化组则从社会文化视角对中东剧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年度学术研讨会，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阿语界较有影响的阿拉伯问题研究学术交流活动。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¹

应惟伟 金华 许欢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要

1992年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两国贸易往来日益增多，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本文用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视角分析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韩国对中国出口和中国总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也拉动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

韩国直接投资 中韩贸易 格兰杰因果分析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研究成果。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韩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两国外贸与投资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东北亚乃至世界的繁荣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自从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外贸总量飞速增长。2010年，中韩进出口总额2071.7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40倍，19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为22%。中国已经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对韩国持续保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有不断扩大之势。在2010年，中方出口687.7亿美元，进口1384亿美元，逆差696.3亿美元，同比增长42.5%。到2010年底，中方对韩国累计逆差超过3900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逆差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近几年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这种逆差的持续存在，国内有少数观点带有一定民族主义的情绪，认为这种逆差不公平，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关中韩两国贸易投资的论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韩国学者所著都不少。对于贸易问题，有学者分析了中韩两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如胡俊芳（2007）；有学者实证分析了中韩之间产业内贸易问题，如范爱军、李丽丽

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近几年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这种逆差的持续存在，国内有少数观点带有一定民族主义的情绪，认为这种逆差不公平，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2006）。但对于解释中韩贸易逆差问题的定量分析却相对很少。

对于直接投资问题，有韩国学者指出，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对韩国企业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刘信一（2007）；有学者则分析了韩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如游德升（2008）。

显而易见，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与韩国对中国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中韩经贸关系的特征。但国内外少有学者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即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有何影响，以及两国贸易是否反作用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本文力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会促进韩国对中国出口吗？——产业内贸易视角

20世纪70年代末，中韩两国就开始有贸易往来。1992年两国建立外

交关系后，贸易量飞速增加。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讯设备、金属制品、服装纺织与电气机械等制造业。韩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带动了大量韩国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出口，很多都可以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解释。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产业部门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的现象；中国向韩国出口某种品牌的电子产品，同时又从韩国进口某种电子产品的这种贸易活动。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即是某项产品的半制成品、零部件在两国间的贸易。在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中，同一产业产品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即要么进口，要么出口；而产业内贸易是双向流动的，因此产业内贸易也称作双向贸易（Two-way Trade）或重叠贸易（Overlap Trade）。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李嘉图到赫克歇尔—俄林，都强调比较优势，认为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是生产率和禀赋的不同，一国总是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贸易理论对直到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主要的国际贸易方式，也就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不同产品的贸易做了比较充分的解释。比如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

机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农产品。换言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针对国与国、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的新现象，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又出现了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

象，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论。这种理论对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是一个飞跃。产业内贸易表现为不同国家在同一产业内部形成了垂直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跨国企业物流成本不断下降，企业间的产业内分工又进一步普遍地发展到产品内分工。即一个产品的许多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生产，然后通过贸易方式在某

一国家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比如说，波音飞机就是由许多国家生产的零部件最后在美国组装而成的。交易成本较小或下降是产品内分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标准化技术与模块化生产的发展也是影响产品内分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韩国这样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有利于其集中资源实现技术创新，并回避范围不经济效应来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和创新生产率，从而具有内生

表 1：中韩贸易投资主要数据

年份	韩国对华投资 (千美元)简 写为KIN	中韩进出口总 额(亿美元)	中对韩出口 (亿美元)简 写为CKEX	韩对中出口 (亿美元)简 写为KEX	中对韩逆差 (亿美元)	中国进口总额 (亿美元)简 写为CNIM	中国出口总额 (亿美元)简 写为CNEX
1992	141,128	50.3	24.1	26.2	2.1	805.9	849.4
1993	264,017	126	54	72	18	1039.6	917.4
1994	649,294	117.2	44	73.2	29.2	1156.1	1210.1
1995	841,134	169.8	66.9	102.9	36	1320.8	1487.8
1996	933,473	199.9	75.1	124.8	49.7	1388.3	1510.5
1997	753,162	240.5	91.3	149.2	57.9	1423.7	1827.9
1998	681,319	212.6	62.7	149.9	87.2	1402.4	1837.1
1999	351,657	250.4	78.1	172.3	94.2	1657.0	1949.3
2000	721,512	345.1	112.9	232.1	119.2	2250.9	2492
2001	650,116	359.1	125.2	233.9	108.7	2435.5	2661
2002	1,051,885	441	155.3	285.7	130.4	2951.7	3256
2003	1,746,444	632.3	201	431.3	230.3	4127.6	4382.3
2004	2,327,752	900.7	278.2	622.5	344.3	5612.3	5933.2
2005	2,772,198	1,119.3	351.1	768.2	417.1	6599.5	7619.5
2006	3,345,939	1,342.4	445.2	897.2	452	7914.6	9689.4
2007	5,226,133	1,599.1	561.4	1037.6	476.2	9558	12180.2
2008	3,752,337	1,683.2	769.3	913.9	146.6	11330.8	14285.5
2009	2,117,369	1,562.3	536.8	1025.5	488.7	10056	12017
2010	3,164,883	2071.7	687.7	1384	696.3	13948	15779

数据来源：韩国对华投资额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KOREA EXIMBANK)，进出口贸易额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

增长效应。对中国而言,这种产品内贸易深化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有助于促进出口。此外,国际产品内贸易通过增加中间产品种类数、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特征以及接受管理技术外溢,能够增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是因为二者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显著技术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又具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也相对较低,于是两国在某些产业的垂直分工就成为必然。再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在不少产业都存在类似情况。林琳(2005)从制成品进出口产业内贸易的角度也做了分析。

已有不少学者实证研究了中韩许多产业存在产业内贸易。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明晰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因果关系(见表1)。事实上,如果这些关系成立,那么,前者与后者之间就应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由表2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与韩国对中国出口

表3: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系数

	韩国对中国投资 KIN	中国出口总额 CNEX	中国进口总额 CNIM
韩国对中国投资KIN	1.000000	0.884735	0.866607
中国出口总额CNEX	0.884735	1.000000	0.996560
中国进口总额CNIM	0.866607	0.996560	1.000000

表4: 韩国对中国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DDK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KIN	13	7.18434	0.04114

的相关性高达0.88,这反映了韩国对中国投资与韩国对中国出口关系密切。韩国对中国投资与中国对韩国出口的相关性也非常高。这说明韩国对中国FDI与两国贸易的关系非常紧密。

三、两国贸易能带动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吗?——相关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分析

从产业内贸易和产品贸易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能够促进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两国贸易能够拉动或吸引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吗?

首先,看看中国的总进口与总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

显然,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见表3)。这说明,1992年以来中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可能是吸引韩国企业来华的影响因素之一。

其次,我们分析两国贸易的发展能否显著拉动或吸引韩国企业对华进行直接投资。为此我们需要对有关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经过单位根检验,KEX和KIN都是非平稳变量。对这两个变量分别进行二阶差分和一阶差分处理后,它们都变成平稳变量。对KEX的二阶差分DDKEX和KIN的一阶差分DKIN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阶数为4),结果如表4。

表4说明,韩国对中国出口不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了,所以韩国对中国出口就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韩国对中国出口拉动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第三,我们再分析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能否影响两国贸易。

表2: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的相关系数

	韩国对中国投资 KIN	韩国对中国出口 KEX	中国对韩国出口 CKEX
韩国对中国投资KIN	1.000000	0.884312	0.888006
韩国对中国出口KEX	0.884312	1.000000	0.954289
中国对韩国出口CKEX	0.888006	0.954289	1.000000

表 5 说明,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是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了, 所以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就是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拉动了韩国对中国出口。

综合上述分析,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韩国对中国出口互为因果。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 而看不到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带给我们的收益。

可以推论的是, 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出口贸易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的竞争, 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吸引外资企业, 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的直接投资。对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资企业而言, 他们发现除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因此外资企业形成了良好的盈利预期,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乐意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因此中国出口的不断增长能够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韩国直接投资为两国贸易及中国出口所带来的正向效应是肯定的。中国的韩资越多, 所创造出来的贸易量也就越大。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可以用图 1 表示。

与此同时, 韩国对中国出口以及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也拉动或吸引

表 5: 韩国对中国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DKIN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DKEX	13	21.2525	0.00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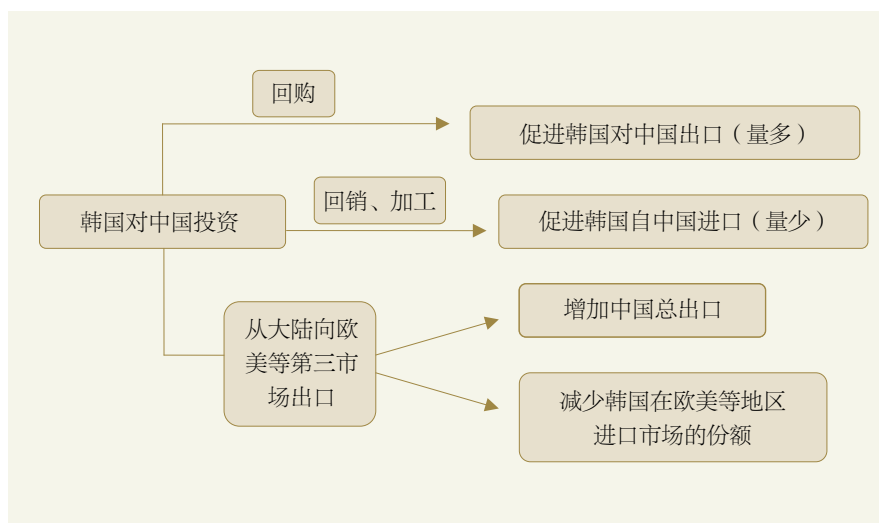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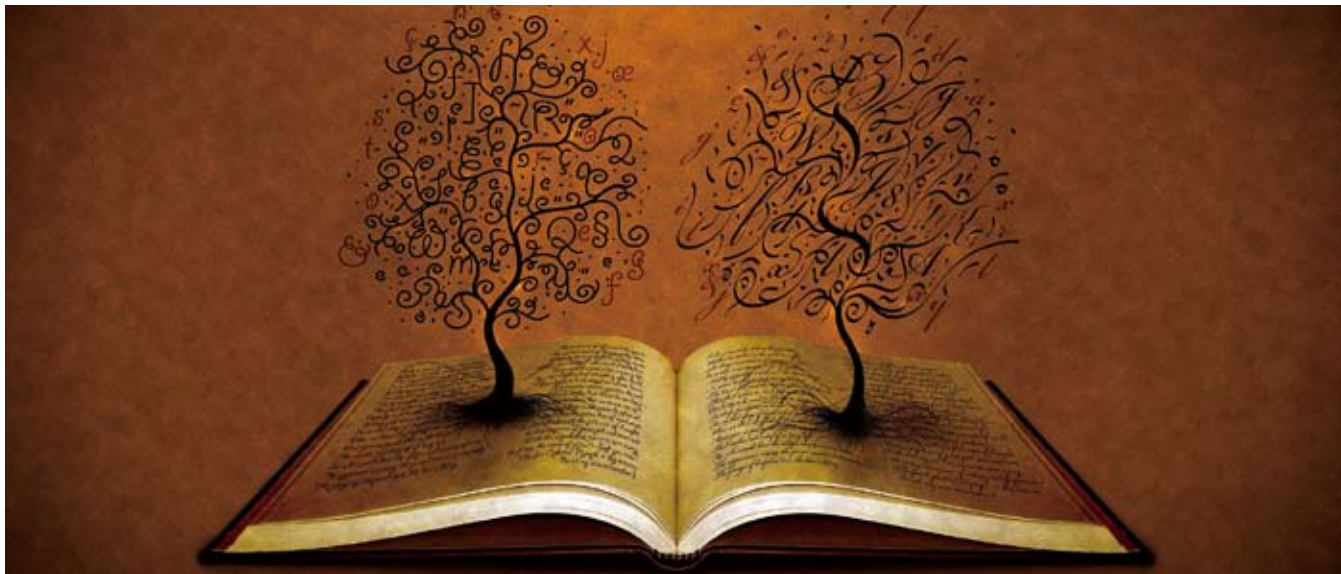
图 1: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两国贸易的基本关系

了大量韩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这说明了, 中韩之间的贸易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始终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

系。简单批评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的观点, 是不准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俊芳:《中韩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2期。
2. 郭羽:《中韩贸易逆差说明了什么》, 载《沪港经济》2007年第4期。
3. 范爱军、李丽丽:《中国与韩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载《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4. 游德升:《韩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和趋势分析》, 载《商业研究》2008年第4期。
5. 鲁桐、郑俊圭:《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中韩经贸关系展望》,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6. 杨励、周文凤:《韩国对华投资现状、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载《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3期。
7. 琳琳:《中国制成品进出口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8. 田文:《产品内贸易论》,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世界汉外双语词典史的缘起¹

杨慧玲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摘要

中国与欧洲辞书传统在 16 世纪中后叶相遇。本文介绍了编于菲律宾的《汉西辞典》、巴达维亚的荷一拉一汉词典、入华耶稣会士的汉葡、葡汉辞典等早期汉外双语词典手稿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缘起阶段的汉外双语词典的共同特点。

关键词

手稿 汉外词典 外词典史 缘起

历史长河中，中国和欧洲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时代背景的差异，辞书传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在中国辞书传统中，字书以解说文字形、音、义为目的，是中国古代辞书传统中类别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而

从欧洲的辞书传统来看，欧洲词典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双语辞典为主。欧洲的单语辞书是随着 16、17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新独立的欧洲各国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通过国家行为创立国家学院 (National Academy)

统一或规范民族语言，在欧洲民族语言规范化进程中才逐渐成为重要的辞书种类的。²1492 年以哥伦布的航海探险为标志，揭开了欧洲殖民、宗教势力进入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序幕，也为世界双语词典增添了新的成员——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研究成果，发表于《辞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2 欧洲外语辞书史，参见 Robert Collison. A History of Foreign-Language Dictionaries. André Deutsch Limited, 1982.

欧洲语言与非洲语言、美洲语言、亚洲语言的双语词典。

作为中世纪欧洲知识和教育垄断者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习和词典编纂传统。随同欧洲殖民者进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自16世纪与中国语言、文化、宗教有了一次较为密切的接触。笔者在此将探讨中、欧辞书传统在历史上的最初相遇。

一、赴菲律宾传教士的汉西词典手稿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的大航海改变了近代世界的格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基督教精神、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积极推行海外扩张策略，两国不断寻找通向东方的新航路，争夺海外殖民地。葡萄牙向东占据了美洲的巴西，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在中国盘踞澳门。西班牙向西，得到了古巴、菲律宾群岛等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入中国。¹

天主教内材料记载，陪同1564年西班牙远征军第一批定居菲律宾的



图1: 手稿汉西词典封面及首页(自右向左)

天主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是第一部汉语词典(*Arte y Vocabulario de Lengua China*)的作者。²然而，从拉达之后菲律宾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情况来看，拉达的汉语词典手稿似乎并未流传或被其他人使用，拉达的汉语能力仍缺乏实据。目前，菲律宾的奥古斯丁会神父拉达被认为是欧洲编纂汉语词典和语法书的最早尝试者。

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传教士与在菲律宾定居的华人及往来于中菲两地的华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据载，马尼拉城内中国人最集中的地方被划分在道明会的传教区域内，因此，道明会神父为了归化菲律宾的中国人

而学习汉语。据龙彼得(Pier Vander Loon 1966-1967)研究，16世纪末菲律宾的天主教神父们主要学习和使用客家方言。第一位在菲律宾向华人传教的道明会士(Miguel de Benavides, 1552-1605)于1587年进入菲律宾马尼拉，龙彼得认为Miguel de Benavides神父虽然掌握了客家方言，但是他读写汉语的能力极为有限，唯独高母羨(Juan Cobo, 1546-1592)不仅掌握了汉语口语，还能够阅读中文书籍并用中文写作。³

教内学者根据高母羨及其他人的通信，认为高母羨编纂了一部汉语词典，然而也有人认为高母羨编写的是一部汉语语法书。⁴由此引发了一个

1 有关葡萄牙、西班牙来到中国的早期历史参阅黄鸿钊主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

2 Robert Streit(ed), *Bibliotheca Missionum V: Asiatische Missionsliteratur 1600-1699*, Verlag: Franziskus Xaverius Missionsverein Zentrale in Aachen, 1929:311.

3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XII, XIII*(1966-1967), London: Lund Humphries.

4 José María González, O.P 编写的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1964-1966) 第五卷 Bibliografías (Madrid) 387 页宣称高母羨的 *Lingua sinica* 是外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柯蔚南和 Joseph A. Levi 合编的英文版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1703) 的序言中，提到高母羨、黎玉范、施方济、万济国等人的汉语语法书都来源于 González 的这部书。

问题：当时传教士们给欧洲总会或教友的通信中常常提到他们正在编写汉语词典或者语法书，但是，他们是否完成了汉语词典或语法书，是否将汉语词典和语法书公开，后人并不清楚，除非在原始文献方面有重大突破，否则多数都无法证实。

一份保存至今的16世纪末菲律宾汉西双语词典手稿是了解早期菲律宾汉外双语词典编纂传统的窗口。这份汉西词典手稿现藏于罗马安吉利卡图书馆(Biblioteca Angelica)。封面上记载了一名耶稣会神父齐瑞诺(Petrus Chirino 音译, 1557-1635)为了归化菲律宾的华人而学习汉语，并于1604年3月31日将此词典献给洛卡(Angelo Rocca, 1545-1620)的情况。¹

齐瑞诺的词典是当前我们唯一所能见到的早期菲律宾汉语学习的手稿文献。这份汉语—西班牙语词典共有83双页，基本上都是单面写字，个别页码双面都有内容。汉西手稿词典以汉字、汉语词语和句子为中心，前几页是在汉字下标注罗马字母注音，在汉字右边标注相应的西班牙语单词；后面部分则注音在左，西班牙语对应词在右。手稿词典按传统汉字书写习惯，从上向下竖行书写，手稿词典也是从右向左翻页。手稿词典内容的排序稍显混

乱，先从“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汉字入手，然后按照类属分类罗列一些日常词、动物词等，包括数字、反义词和近义词，后面逐渐增长至一些常用短句如“照只样做”、“无主意”、“起動你共我說”、“爾要幾日用”、“尔要若干工钱”等。最后的长句中间又夹杂几页如“憶着、今即、早間、昨晚、黃昏、明日”之类的词，随后又有几句讨债的对话，反映的是客家方言日常生活口语。

通过这个相当原始的双语词典手稿，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在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士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过程。中国人指着某一个东西告诉他汉语叫什么，他就用西班牙语字母记下中国人的发音，然后写上与之对应的西班牙语词。手稿词典先从日常用品及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及汉语数字开始，逐渐积累汉语词汇，之后扩展到简单日常生活和贸易常用表达和短句，然后是长句。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人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词典的汉字全部由中国人书写，从词典的编排方法和内容来看，也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导的。这部手稿词典以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为部首构字开始，把动物、植物、日常用语分门别类地列举，同时还收入了汉语蒙童教材中的近义词、反义词对照表，强化内容的语义关联性，

便于记忆。手稿词典中没有出现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也没有收入任何与欧洲事物相关联的新词，这些都说明这是以中国人为主导、与天主教传教士共同合作编写的一份手稿词典。

二、入华耶稣会士的手稿葡汉、汉葡双语辞典

自1560年第一批耶稣会士到达澳门定居并展开传教及其他活动后，耶稣会士陆续来到澳门，1571年耶稣会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圣保禄公学。然而，当时居住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们的汉语水平非常有限，并未意识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首先进入中国并学习汉语的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紧随其后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他们二人合作编写了一部葡汉辞典手稿(约1583-1588)。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手稿，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存放了三百多年，其作者和编纂时间不为人知，直到德礼贤(Pasquale D'Elia, 1890-1963)1934年发现了这部手稿，鉴别出这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作品。1989年杨福绵继而全面研究了这部葡汉辞典手稿。

《葡汉辞典》共收入约六千多个葡语词条，按葡语词条首字母A-Z排

1 高田时雄文中翻译了封面的献词：“汉西辞典。这是耶稣会士彼得·齐瑞诺神父通过与在菲律宾有超过四万居民的中国人的会话学到的语言，谨将本书献给彼得·齐瑞诺本人所尊敬的祭衣司事祝下。1604年4月30日”，高田时雄判断这部词典编纂于1595—1599年，见高田时雄：《SANGLEY语研究的一种资料——彼得·齐瑞诺的〈汉西辞典〉》，载陈益源主编：《2009 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2009年，第663—671页；意大利马西尼认为这部词典编写于“1595—1602年间”，见Federico Masini. Chinese Dictionarie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Xiaoxin Wu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005:184.



图2：罗明坚、利玛窦
葡汉词典手稿



图3：耶稣会藏汉葡
手稿词典

书写的意大利语对应词。《葡汉辞典》收录的词汇和短句既有明朝官话，也有南方方言，编纂这部辞典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明朝官话口语。遗憾的是，这部辞典并未完成。

杨福绵还澄清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合编的葡汉辞典外，利玛窦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 等人在旅途中还编了另一部汉葡辞典。¹ 至今，学者们尚未找到这部汉葡辞典，文中提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一部手稿，² 笔者认为这部汉葡辞典抄本的成书时间大约在17世纪中后叶。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了一部17世纪早期的手稿汉葡辞典。这部手稿辞典的编号为 Japonica-Sinica IV7，原封面和装订已经遗失，现内封里粘了不到一寸宽的原封皮的残片，烫金字仅存几个字母。耶稣会档案馆对何时更换原封面、原封面上有何内容没有任何记载。查阅《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举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一书，耶稣会陈绪伦神父认为这部汉葡辞典的时间不

序。第一竖行的葡萄牙文词条既有单词，又有短语；杨福绵以 Aquoa (水) 为例说明葡萄牙语词条是考虑到汉语的通用情况而精心挑选出来的。第二竖行是罗马注音，罗明坚书写。杨福绵对罗马注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发现

罗明坚常常是如实客观地记录了中国教师的发音，因此这些罗马注音中掺杂了中国教师的方言音。第三竖行是对应的汉语词条或短语，是由中国人书写。第四竖行是意大利语的对应词，这一部分极少，仅 32a–34a 有利玛窦

1 “神父们利用这段时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他们也编了一套中文发音表，这对后来传教士们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帮助……神父们决定，以后用罗马拼音时，大家一律利用这五种符号，为了一致，利玛窦下令，以后大家都要遵守，不可像过去那样，每个人一种写法，造成混乱。用这种拼音法现在编的字典，以及以后还要编的其他字典可以使每位传教者，都能一目了然”，见利玛窦著、刘俊余、王玉川译：《中国传教史》，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286—287页。

2 方豪提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曾购入《中葡字典》抄本一种，不署撰人姓氏，亦无序，大约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或次年，原为意人罗士（C. Ros）所藏。编目为 22.658。此字典附有七十七位耶稣会士中西姓名等。”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看了抄本，是一部6.7厘米宽，10.2厘米长的袖珍抄本。词典后附录有一个从1624—1688年的中国纪年表，一个从1581罗明坚至1659白乃心共75位入华耶稣会士名录，16位中国耶稣会士名录。这个抄本词典中许多基本汉语词汇“腕、腹、肾、脏”都没有葡萄牙文对译词，与罗明坚、利玛窦的《葡汉辞典》的重要特点不符，因此笔者判断，国家图书馆的这个汉葡词典不可能是利玛窦的汉葡词典，而是17世纪中后期的一部词典。

早于1625年，因为辞典中提到了景教碑，而此碑是1625年在陕西发现的。此外，这部辞典不避清讳，称满族人“虜酋”，其他用词如“东厂、典史、衛所、里长、员领”也都是明代特有的用词(Chan, 1998: 543-544)。在1625年至明末，编写汉葡辞典的耶稣会神父只有费奇观(Gaspar Ferreira, 1571-1649)和曾德昭(Alvarez Semedo, 1585-1658)，两人都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然而，要想进一步确定这部汉葡手稿辞典的作者，仅靠一个未完成的抄本和教会记载是无法实现的。

这部手稿汉葡辞典字迹工整，从最后几页明显可看出这部手稿辞典并未完成。汉葡辞典约1300页，每页有十竖行，每竖行内有三横行的汉字词条，汉字词条上方标明注音，汉字词条下有葡萄牙文的对应词和注音形式的例词。辞典中有空白条目，也有一些只有汉字词条而无注音和释义的情况。据初步统计，这部尚未抄完的手稿辞典约收7228词条，辞典总体上按汉字的注音排序，词目中既有汉字，也有汉字词组、短语，例如“水、朝水、水沟、水手、水脚、水桐、雨水、水银”、“猜、猜疑、猜拳”、“脏腑、五脏心肝肺脾肾”等，词和短语所占比例与汉字词目相当，以口语词为主，兼收一些书面语词。释文中有注音形式的汉语例证和葡文释义，例词较丰富。

由于这部词典抄本并未完成，不清楚原稿本是否有附录或者检索表之类的前后页材料。按注音编排汉语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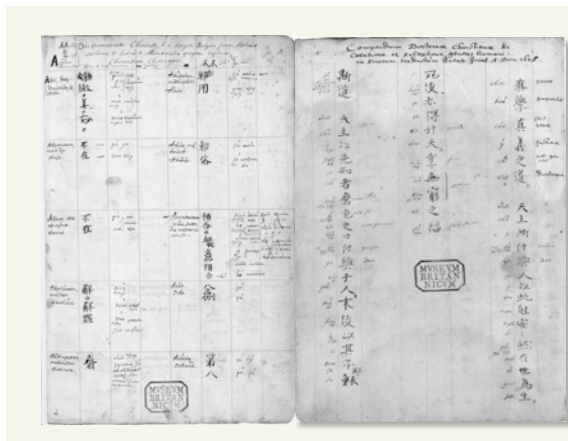


图4：巴达维亚荷—拉—汉手稿词典正文及附录

的用意在于解决听到音而不知汉字和含义的问题。对于欧洲传教士，如果熟悉这个词典的注音方案，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按音排序的词典。然而，汉语词目中的词语或短语有时会放在其中一个核心字下面，会出现因不知哪个是核心词，反复查找的情况。如“羞愧”是在“愧”的核心词后，“打惯他”在“惯”核心词后。耶稣会汉葡词典做得较好的是，除了重复的字不重复注音，其余的字词都有注音，如不知“羞愧”在“愧”下查找，也可以通过排除法，在“羞”字里找不到而转向“愧”。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各地方言殊异，如果听音查阅按注音编排的词典，即使有“官话音”，但也不可能像今日的普通话有统一的标准，通过教育和媒体在民众中得以普及。因此，若没有其它检索表或方式辅助，按音编排的汉外词典仍会存在使用难的问题。这部词典的词目安排方式对学习汉语有帮助，如果以此词典做教材，通过学习一个核心字，很快就可

以掌握它的搭配词和意义，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汇有促进作用。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辞典的特殊意义在于，利玛窦和郭居静在编写汉葡辞典时，有意让所有入华传教士掌握并使用他们的最新汉字注音法，承载大量汉字和新注音的汉葡辞典被其他耶稣会神父使用并广为流传的可能性极大，那么，继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神父编纂的汉葡辞典中必然借鉴且包含了利玛窦汉葡辞典的精华。因此，这部手稿辞典抄本可以作为了解明末耶稣会汉葡辞典传统的一个窗口。

三、巴达维亚的手稿荷—拉—汉词典

大航海后，葡萄牙人最早发现了通向印度的航线，到达了中国海岸。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加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扩张，与西、葡殖民者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凭借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实力，荷兰人1603年在巴丹建立了第一个贸易基地，1619年占领巴达维亚。第一位到达巴达维亚的荷兰新教传教士赫尔尼俄斯(Justus Heurnius, 1587-1651/1652)开创了荷兰人学习汉语和编纂汉语词典的先河。1624至1632年他在巴达维亚传教，为了让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当地定居并信奉基督教，他对中文产生了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名懂拉丁文的中国人，跟随这位中国人学习汉语的同时，编纂了这部荷兰语—拉丁文—汉语词典。

赫尔尼俄斯的汉语知识非常贫乏。他编写词典时，先编入荷兰语和拉丁语词条，然后在懂拉丁文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把拉丁文译成汉语。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这名中国合作者当时在巴达维亚做教师，以前曾在澳门接受过教育，因此懂得拉丁文。这部词典是荷兰文—拉丁文—汉语手稿词典，现查明有三个稿本，一个是大英博物馆藏本 Sloane 2746，一个是荷兰莱顿大学藏本 Acad 225，另一个是牛津大学藏本 Marsh 678 and 456。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鉴别了手稿词典的作者，对相关人物关系作了考证。高柏(Koos Kuiper)的研究更进一步，他对这部词典的三个版本、流传、词典文本编写等进行了探讨。¹

这部手稿词典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词典正文，第二部分是基督教内容附录，第三部分是日常生活文书附录。高柏对词典的一些条目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些荷兰词仍没有找到中文对应词；词典中的基督宗教术语，经常使用的是从葡萄牙文转写过来的汉字音，如Baptismum(葡萄牙文bautismo)巴第斯磨，明显借用了耶稣会的材料。此外，这部词典中和鸡蛋相关的词，四处中竟然三处都有错误，表明在转译过程中，词典作者和中国合作者出现的语言水平和沟通问题。

这部荷兰—拉丁—汉语词典的附录极为丰富。笔者考察了附录中非基督教义的部分，发现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万宝幼学须知》的内容多有重合。《万宝幼学须知》是一个集蒙童识字、写字、增广见闻、书写日常文书于一体的自学课本，给这些学习材料配上罗马注音和外文释义，堪称最佳的实用汉语学习教材。这样的附录与词典正文查检汉字的功能相结合，就可以构成一个词典兼学习教材的综合统一体。

四、萌芽时期汉外双语词典的特点

原本平行发展的欧洲辞书传统和中国辞书传统，随着大航海后欧洲殖民者、商人、传教士的到来，形成了交叉乃至重合、遥相呼应的一段词

史。16世纪中叶欧洲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见证了这段独特的双语词典史。萌芽时期的汉外双语词典，体现出以下特点：

1. 根据传教需求选择学习的目标语言。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多选择了当地华人的语言——客家话和漳州方言，而在华耶稣会士则一开始就选择了官话。其他入华托钵修会如道明会、方济各会曾经经历过一个从方言到官话的转变，最终，汉语官话成为大多数在华天主教士的共同选择。

2. 汉字注音方案的沿承。从罗明坚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开始，经利玛窦、郭居静等人的改良，利玛窦等人在汉葡辞典中已经可以利用罗马注音方案，按照欧洲辞典的编排法把罗马注音方案从A—Z排序。利玛窦还下令所有的在华耶稣会士学习并使用他们制定的注音方案，目的在于保持罗马注音方案的一致性。1626年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沿承了前耶稣会士利玛窦、郭居静等人的注音方案，同时在中国著名学者王徽、吕维祺等人的帮助下，进一步统一了罗马字母注音方案。不仅如此，万济国的注音方案与《西儒耳目资》方案的相似性表明，其他入华修会也借鉴使用了耶稣会士的注音方案。

3. 确立了字母排序法为主的双语

¹ 高柏(Koos Kuiper)原文“The earliest monument of Dutch Sinological studies: Justus Heurnius’ s manuscript Dutch-Chinese dictionary and Chinese-Latin *Compendium Doctrinae Christianae etc.* (Batavia 1628)”刊登在荷兰莱顿 Quaerendo. 35/1-2. Brill Leiden, 2005:109-139. 笔者已获莱顿博睿出版社中译版权，中译文“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赫尔尼俄斯的手稿荷—拉—汉词典与汉—拉《基督教概要》”将在《国际汉学》第22期刊登。

词典编排方法。虽然菲律宾的手稿汉西词典是按主题编排的，然而，大多数手稿双语辞典都采用了字母排序法。外汉词典的字母排序法沿承欧洲辞书传统的主流做法，而在汉外词典中实现字母排序却是极大的创新。

中国传统的辞书排序方式以部首排序法为主，也有按音排序的音韵类辞书，但是这两种检索方式对初学汉语的欧洲传教士来说都不易使用。使用部首排序法的字典，使用者只能解决阅读中遇到的生字，而且必须熟知汉字的构字规则，还需要有相当的识字量才能使用这类字典。按音排序并附有简单字义解释的中国音韵类辞书，也必须掌握音韵学知识和相当数量的汉字才能使用，即使中国文人都很难使用韵书类辞书。因此，入华初期的欧洲传教士并不依赖中国辞书，通常也不采用中国辞书的编纂方法。从词典内容上看，中国辞书往往收入书面语字和意义，选取例证也有崇古倾向，不能满足刚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对汉语学习的需求。这些入华传教士来到陌生的国度，需要能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基本“口语”表达，其次是通过书面语或口语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最终达到用汉语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入华初期的欧洲传教士最需要的是适合初学者程度，双语对照的“汉语口语典”，同时，汉外词典还必须方便检索和使用，对字词和文化的解说也必须是入华传教士理解的语言。在生活当中，入华传教士经常听到或者

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中对汉字或词语的译义，多源自他们生活中的积累或者向身边中国人咨询完成的。入华欧洲传教士在学习汉语之初，对中国助手或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也是萌芽阶段双语词典编纂的必经之途。

读到一些不懂的汉字或句子，这种情况刺激了他们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激发了此类辞书的编写。

由于从第一位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时代开始，在华传教士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因此，早期词典编者利用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开创了汉外词典的字母排序法，解决了欧洲人查阅汉外词典的检索问题。利玛窦与其他人合作编写的汉葡词典开启了汉外双语词典的新时代。

4. 收词量和译义等方面的发展

早期欧汉词典或汉欧词典有一个共同特点，对应词形式的欧洲语言和汉语都不是字（word）的对应，而是以表达为主的对应，既有字、词，也有短语形式的对应。

从收词量来看，即使是罗明坚和利玛窦最初编写的葡汉词典，在当时很多葡语词仍找不到汉语对应词的情况下，词典的收词量也有五、六千条，一些葡语词目后还有两、三个同义或

近义对应词。相比之下，菲律宾的手稿汉西词典以及巴达维亚的荷一拉一汉手稿词典的收词量不如在华天主教士编写的词典内容丰富，然而，这两部词典都收入了一些对话或其他材料，尤其是荷一拉一汉词典还有百科全书式的附录。

汉外或外汉双语词典中对汉字或词语的译义，多源自他们生活中的积累或者向身边中国人咨询完成的。入华欧洲传教士在学习汉语之初，对中国助手或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也是萌芽阶段双语词典编纂的必经之途。

笔者对17世纪的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欧洲文字没有深入研究，无法深究这些早期汉外词典手稿中是否都存在这样转译的情况。从历史背景来看，作为汉语初学者的欧洲传教士编写这样的双语词典，都有中国合作者，他们之间或许可以直接沟通，或许要通过其它语言为媒介沟通，中国合作者的参与程度肯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以往记录中，中国合作者往往被忽视，著者名下只有入华传教士的名字。在没有作者署名以及知识产权概念的那个时代，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虽然我们今天很难考证这些中国作者或合作者的姓名，但是应该清楚，在汉外双语词典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批匿名中国合作者的存在和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问题与视角：西方易学的三种研究路径¹

赵娟 / 复旦大学中文系

摘要

本文试图截取“西方易学”的三种重要研究路径，对其研究历史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做简要概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他们在《周易》文本性质、作者、经传关系及历史诠释上的差异，从而展现“西方易学”作为西方学术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是如何根植于西方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本身，进入到人类生存基本问题的探讨中的。

关键词

西方易学 宗教学 荣格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英语世界近六十年易学研究重要论著提要》的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韩振华，本文为课题组成员赵娟的署名文章，发表于《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

引言

“西方易学”是一个庞杂的研究领域，它涉及的时间跨度、语言和文化背景都十分丰富。本文并非对西方周易研究史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进行纵横描述，而只是用素描的笔法勾勒一下西方《周易》研究的三种重要路径，看《周易》在异域文化中是如何引起关注，以及如何被关注的。

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两点须澄清和说明：前者关系到论题的科学性；后者关系到表述的一致性。

第一，关于“西方”的概念问题。中国文化所指之“西方”，是一个有自身历史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所差异。这一值得研究的概念本文暂且不做细论，仅做简

要说明：于当前中国文化而言，通常意义上的西方主要包括欧洲和北美，说得更狭隘一些，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最主要是英语世界。但即使在“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层次的多元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忽视的问题，如欧洲大陆与英美的差异，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差异。另外，俄罗斯于中国而言，是“东”是“西”一直都是一个颇有些为难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将其列入本文圈定的范围。¹但总的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我们观察到的整体特征远甚于其内部差异。

本文所涉及的一手文献材料，主要来自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也包括从其它语言翻译为英语或德语的研究著作，例如从俄语、法语等，当然也

包括中文）。令人稍感庆幸的是，西方这两种语言中的《周易》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1）西译《周易》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个译本是用德语和英语完成的。一个是理雅各（James Legge）²在19世纪后半叶翻译的第一个完整英译本³；另一个是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⁴20世纪上半叶翻译的德文本⁵，1950年拜恩斯（Cary F. Baynes）女士根据德文译本将其翻译为英文，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伯林根系列（Bolinggen Series）出版⁶，成为西方易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⁷（2）从出版著作、发表论文、西方易学研究者、易学出版机构和刊物、学术交流来看，英语和德语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同时英语和德语也不断吸收

-
- 1 前苏联或俄罗斯的《周易》研究成果，若是翻译为英语等西语，对西方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仍然在本文的关注范围之内。例如前苏联汉学家休斯基的《周易研究》。（J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tran. By William L. MacDonald, Tsuyoshi Hasegawa, Hellmut Wilhel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2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国苏格兰汉学家。1839年被英国基督教新教公理宗的伦敦传道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1843年随英华书院迁往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1841年开始着手中国经典的翻译。1870年完成《十三经》翻译，获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重返香港主持英华书院。1870年至1893年任香港佑宁堂教区牧师，1893年访问中国大陆。1896年至1897年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1882年英译《周易》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1899年在英国鸦片商人巔地资助下的中国经典系列中再版。此译本被称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旧约全书”。
 - 3 James Legge trans.: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The Yi King, 1899. - XXI, 448 S. . -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16).
 - 4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德国神学家，传教士，汉学家。1899年来华传教，后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曾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华居住达25年之久。在清朝遗老劳乃宣的帮助下翻译了德文本《周易：变化之书》，1924年在耶拿出版，成为西译《周易》的蓝本和典范，被誉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卫礼贤同时还翻译了《老子》、《孟子》、《中庸》、《大学》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著有《中国心灵》等。
 - 5 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erläutert*, Jena 1924.
 - 6 Richard Wilhelm, Tran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 (published in one volume),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C.F. Bay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50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伯林根系列（Bolinggen Series）分两卷出版。次年由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在伦敦出版。1967年发行第三版时，将两卷并合为一卷，并由卫德明增加了序言，特别阐述了《周易》的经典意义，且增加了书目索引。此后，该书一直在英语世界重印和重版，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7 Edward Hacker, 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xiv. 编著者在绪论《时空中的〈周易〉》中指出：《周易》的西行始于17世纪，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用拉丁文介绍和翻译《周易》，但直至19世纪，西方仍未真正认识到《周易》的核心意义和价值，二战后，《周易》才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而西方对《周易》的关注，1950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便是卫礼贤和拜恩斯版本的《周易》在英语世界的出版。

其它语言的《周易》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自身的研究，交流研究成果。¹另外，对于在欧美国家接受研究生教育获得学位、从事相关研究并且用西文（主要是英文）出版学术著作的这类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及其学术成果，本文也将其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

第二，关于“周易”的名称问题。本文是在如下意义下使用《周易》这个名称：《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指上、下经，共六十四卦，由卦名、卦画、卦辞和爻辞组成；《易传》亦称作《易大传》、“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

海外汉学中“周易”之释名和国内易学一样，不同学者理解上有差异，因此具指对象也不一样，翻译也存在差别，如 I Ching, Yijing, I Ging, Yi King, Zhouyi。主要存在两种主要观点：（1）一种观点认为由六十四卦卦名、卦画、卦辞和爻辞所组成的部分为“周代之易”，称《周易》；“十翼”本身就是“经”的一部分，二者合为儒家经典称为《易经》。代表人物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chaughnessy）等人。²（2）另一种观

西方最早了解和研习中国古代经典，以及最早在西方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始于梵蒂冈教廷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作为“五经”之首，自然也受到传教士们的关注。

.....
点认为早在“十翼”之前，六十四卦爻辞已有称为“经”之说，且《易传》其为“传”是对“经”的解释，因此《易经》和《易传》合称《周易》。

本文中，原来音译为 I Ching, Yijing, I Ging, Yi King, Zhouyi 等，凡内容包括经、传，全部译作《周易》；凡只指六十四卦名、卦爻辞的，称为《易经》；凡其内容指称“十翼”的，统称为《易传》。译著作书名则保持原名。³

欧洲《周易》研究史从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算起，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周易》在西方被怀着不同企图和兴趣的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关注、思考和研究着。笔者从研究问题与视角、研究方法和所承

学术传统之差异等方面，截取西方易学研究的三种重要路径：（1）以传教士汉学为母体的宗教学路径；（2）以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为起点的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学路径；（3）以历史实证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路径。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条研究路径之背景、方法和目标进行描述，并将他们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探讨本质上作为西方学术一部分的西方《周易》研究，是如何根植于西方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同时又是如何在历史上与作为《周易》母体的东方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一、以传教士汉学为母体的宗教学路径

西方最早了解和研习中国古代经典，以及最早在西方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始于梵蒂冈教廷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⁴《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作为“五经”之首，自然也受到传教士们的关注。但由于这部晦涩难懂的书让传教士们颇感为难，因而比起其它典籍的研习节拍略为迟缓。⁵1626年（明天启六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在杭州刊印了包括《周易》

1 Edward Hacker, 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2 Edward L. Schaughness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PhD diss. in Chinese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3 如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中，“易经”虽然指《周易》，但是作为引文书名，为了查阅准确，保持不变。

4 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65-1655）等人都因为没有时间，或只是难以理解而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国哲学和宗教。马爱德（Edward J. Malatesta）编：《利玛窦〈天主教义〉介绍和注解》（*Introduction and Note to 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1985年。

5 张西平：《梵蒂冈图书馆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载《文献季刊》2003年第3期。

在内的“五经”(Pen tab ilion Sinense)拉丁文译本。1682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带了四百余卷由传教士编撰的中国文献回到欧洲,其中也包括《周易》介绍和研究方面的文献,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早期汉籍藏本。¹186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与另外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合作的《中国贤者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²该书《导言》中提出“经”比“书”地位重要,《周易》是“五经”中最古老的,但在重要意义上居第三。《导言》附有64卦的卦图,按通行本卦序排列,每经卦之上用拉丁文字标明其象征意义。同时还介绍了伏羲八卦、伏羲八卦图(先天八卦图),以及周文王六十四卦卦图,并且分别用阿拉伯数字标出。他们弃朱熹而引张居正,认为《周易》是宋明理学的渊藪,而宋明理学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特质,这点与天主教是相悖的。总体而言,这部书并非是对《周易》的专门研究,对《周易》的介绍也颇为模糊。

耶稣会士中真正深入《周易》研究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与他的学生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和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他们创立了“中国索引学派”³,他们将天主教的诸多概念纳入对《周易》的解释之中,他们通过象征学的附会,将“上帝”、“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十字架”等天主教的概念与《周易》中“太极”、“三才”、“阴阳”、“道”等联系起来,从而试图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与天主教的一致性。⁴“臣二人(白晋和傅圣泽)日久曾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士秘学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经稿》,无不合于天教。”⁵他们通过对《周易》的研习,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从而试图说服人们接受上帝的信仰。

总体而言,早期传教士对《周易》的态度比较纠结,一方面他们对宋明理学家的唯理和唯物的维度表示反对,因为这使得“上帝”的存在丧失了合理性;另一方面对于汉代象数易学的

唯占唯用的神秘主义维度也不支持,因为这个常常夹杂着中国人的“实用”企图,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背道而驰。他们要在《周易》这部古奥之书,找到上帝存在的依据,将中国的历史纳入到基督教的历史逻辑之中。尽管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具体的解释和演绎方法上存在着差别,但在《周易》中寻找上帝的根据是不变的。

早期以在华传教士为主体,披着神学外衣的《周易》研究,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以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神学或者宗教学领域,将《周易》和《圣经》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共通之处成为一种研究思路。西方第一篇以《周易》为题的博士论文——1967年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周易〉中作为凶象出现的〈明夷〉卦》(Die Verwundung des Hellen als Aspekt des Bösen im I Ching, Cham: Gut-Druck AG)便是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完成的,作者为阿利亚娜·鲁普(Ariane Rump),用德文撰写而成,1972年在纽约发行英译本,⁶该论文

- 1 其中有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 1599-1666)等人。“本书主要编者虽为殷铎泽,但参与者有郭纳爵等17名耶稣会士,其中意籍会士5人、葡籍会士5人、法籍会士4人、比利时籍会士2人、奥地利籍会士1人,可以说是欧洲宗教界和知识界的鼎力之作。”参见赵晓阳:《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恒道》第二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 2 实际上只有三书,尚缺《孟子》:一种说法是译者觉得《孟子》篇幅过长,翻译工程过大,经历有限;另外也有说法,认为《孟子》的诸多说法与基督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例如,“性善论”与“原罪”等。
- 3 关于这一称谓的背景和含义参考:【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第二节:“17世纪神学研究中的古代神学和索引思潮”;第五章第一节:“中国索引学理论”。
- 4 具体研究可以参见:【德】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五章:“马若瑟的索引学理论”。
- 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
- 6 Ariane Rump: *The Darkening of the Light as an Aspect of Evil in the I Ching*. Columbia University, 1972.

以“明夷”卦为核心探讨宗教的罪恶问题。也有些学者或者神学研究者如 Joseph McCaffree 的《〈周易〉与〈圣经〉的关系》,¹李静贤 (Jung Young Lee) 的《拥抱变化: 基督教视野中〈周易〉的后现代诠释》,²其要旨仍然通过文本的分析比较, 试图证明,《周易》这一古老东方文本的智慧与西方神学有着某种天然的默契, 对于人们理解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以荣格为起点的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路径

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这一研究路径是以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为起点的, 尽管荣格对《周易》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分析心理学的范围。他将《周易》作为带有东方宗教意味的文本, 或者是早期原始思维特征的文本, 看成是西方之外的“蕴含着东方智慧的书”, 视为人们反思当代工具理性的一

早期以在华传教士为主体, 披着神学外衣的《周易》研究, 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以及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种思想文化资源。荣格和他的追随者在分析心理学的领域广泛而熟练地借助《周易》, 进行分析心理学的实践, 对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荣格自己说, 他“在 1920 年代初期遇到尉 (笔者注: 卫) 礼贤时, 对《易经》(《周易》) 已经相当熟悉。尉 (笔者注: 卫) 礼贤除了肯定我所了解的事情以外, 还教导我其它更多事情。”

在荣格看来, 理雅各的版本对于西方人理解《周易》这本晦涩难懂的著作没有多少贡献, 而卫礼贤的译本使得《周易》能“为西方人的心灵所理解”, 因为他“把握住了《周易》生机勃勃的意义”。对荣格而言,《周易》的“占卜作为探究潜意识的方法, 似乎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³荣格借助《周易》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即“同时性” (Synchronicity, 也译作共时性、同步性), 认为这是与主导现代社会的“因果性”不同的事物关联方式, 这些被科学努力排除的“几率”, 恰恰是“潜意识”非常重要的构成方式。⁴

承自荣格传统的“爱诺斯周易项目” (Eranos I Ching Project), 不仅尝试着将《周易》翻译为各种不同的西方语言, 同时围绕《周易》进行多领域、跨学科的探讨, 出版了论文集,⁵ 其中在利策玛 (Rudolf Ritsema) 和卡赫 (Stephen Karcher) 主持下重新翻译了“爱诺斯”版的《周易》英译

1 Joseph E. McCaffree: *Bible and I Ching Relationship*. illus. Hong Kong & Seattle, WA: South Sky Book Co., Ltd.1982.

2 Jung Young Lee: *Embracing Change.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 on the I Ching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1994.

3 荣格、杨儒宾译:《东洋冥想的心理学: 从易经到禅》,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第 205—206 页。

4 关于这一概念的专门探讨可以参见: Aziz, Robert: *C. G. Jung'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ynchronic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Roderick Main: *Jung on Synchronicity and the Paranormal*, London: Routledge, 1997; Victor Mansfield: *Synchronicity, Science and Soul-Making*, La Salle IL: Open Court Press, 1995; Ira Progoff: *Jung, Synchronicity and Human Destiny*, New York: Dell Books, 1973; Peat, F. David: *Synchronizität: die verborgene Ordnung*, München: Goldmann, 1992; Peat, F. David: *Der Stein der Weisen: Chaos und verborgene Weltordnung*, München: Dt. Taschenbuch-Verl., 1994.; M. D. Faber: *Synchronicity: C. G. Jung,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Westport, Conn [u.a.]: Praeger, 1998; *Natureklärung und Psyche*. – Zürich: Rascher, 1952. – 194 S. – (Studien aus dem C.-G.-Jung-Institut Zürich ; 4), 1952.

5 Karcher, Stephen: *The Yi Ching and the Ethic of the Image: Reflections at the 1992 Eranos/Uehiro Round Table Session*, In *Eranos 1992: Jahrbuch-Yearbook-Annales*. Vol.61.

文本。¹该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周易》的分析心理学译本。译者有意与以往过多借助宋明理学的哲学化翻译保持距离，力图返回到《周易》卜筮之书这一原点。该版本不仅有《周易》的介绍、翻译，还附有推荐阅读书目，该书可以说是一本《周易》使用手册，或者说是分析心理学家的实用手册。同时，在分析心理学领域涌现了大量以分析心理学和《周易》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研究著作。²另外由 Edward Hacker、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等人编撰的《西方〈周易〉文献提要》也带有明显的“爱诺斯色彩”，存目了大量的以分析心理学角度研究《周易》的博士论文和研究著作。³德国戈文达喇嘛 (Anagarika Govinda) 的《〈周易〉的内在结构》⁴虽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是其关注的问题和影响仍然在荣格开创

的传统之中。他试图抛开《周易》两千年的注疏传统，认为 2500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对《周易》的解释和研究与《周易》本身没有关系，他试图探讨《易经》的最早体系的意义，从而把探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认为的“八卦”上，他认为这才是《周易》早期思想和体系的体现。他的探讨涉及到当下学术界感兴趣的许多问题，例如，精神价值的追求、逻辑的限度、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关系、自然的智慧等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在该书中得到扩展，依然是秉承荣格、卫礼贤以来的传统和问题意识，他将这些问题留给读者继续思考。

三、以考证和思辨为特征的历史—哲学路径

在早期传教士的《周易》研究中，也有从历史角度对《周易》卦爻辞、

历史年代进行考证的学者，⁵但是其考证与结论大多是附会天主教或基督教之教义，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该路径中的研究者对历史的研究通常与中国古代思想的诠释联系在一起，带有哲学思辨的特征，因此将其概括为历史—哲学之路径。持该研究倾向的学者将《周易》看作是中国特定时期形成的特定文本，这一文本的历史诠释在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周易》及其诠释成为理解和研究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钥匙。

早期西方世界的《周易》译本为宋学笼罩，《周易》被看做研究儒学道统的重要文本。⁶尽管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有美国学者韦利 (Arthur Waley) 将清代易学和近代以来的“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的重要性提了出来，但是对于西方学者并没有产生实

- 1 Ritsema, Rudolf and Stephen Karcher: *I Ching—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with Concordance— The Classical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Shaftesbury, Dorset, England: Element Books Ltd., 1994. Rochport,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Element Inc., 1994. Milton Brisbane, Australia: Element Books Ltd. 1994.
- 2 Hook, Diana farington: *The I Ching and Mankind*,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5.
Hook, Diana farington: *The I Ching and its Associ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Hook, Diana farington: *The I Ching and You*, Dutton, 1973. Routledge; New edition edition (December 1985.)
Siu, R.G.H: *The Man of Many Qualities: A Legacy of the I C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8.
Sloane, Don Bald F. Sloane: *T' ai Chi and the I Ching: the Chinese System of Yoga the Hexagram of Peace*, Published by the Solar T' ai Chi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al Great Brotherhood, St. Louis, MO. 1976.
Everett Kleinjans: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I Ching*. Singapore: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9.
Public Lecture Series No.11; Roy Collins: *The Fu His I Ching: The Early Heaven Sequence*,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Jean Shinda Bolen: *The Dao of Psychology: Synchronicity and the Self*. First Harper & Row Paper edition, 1982.
Combs, Allan and Mark Holland: *Synchronicity: Science, Myth, and Trickster*. New York: Marlowe & Company, 1996.
- 3 Edward Hacker, 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4 Lama Anagarika Govinda: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I Ching: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San Francisco: Wheelwright Press, 1981.
- 5 如马若瑟对《周易》颇感兴趣，曾通过《易经》卦爻辞史料考证，断定中国纪年体古史比其他各国历史的可信度高。著有 *L' an—quite des chinios prouvee par lesmounments* (《中国古史实证》) 等七部汉学著作。
- 6 理雅各版本、卫礼贤版本皆如此。

质性的影响。¹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才对西方学者历史地研究《周易》产生了重要影响。1979年俄国汉学家休斯基的《周易研究》也被翻译为英文出版。²该书涉及到语言学、词源学、纪年学、诠释学等诸多领域。他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象来理解《周易》，并且探讨《周易》文本中语言和结构的原初意义。他在儒道佛方面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角，使得该书的研究材料和视角都极具深度和广度。当然他对《周易》的深入理解除了得益于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扎实的哲学研究功底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王弼、Wan I 和 It ō T ō gai 的《周易》注疏。

美国汉学家夏含夷198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周易的成书》，该文探讨了《周易》文本的创作、构成及其解释等诸多问题；1996年帛书《周易》译本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本帛书《周易》的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加拿大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则翻译了

美国汉学家夏含夷198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周易的成书》，该文探讨了《周易》文本的创作、构成及其解释等诸多问题；1996年帛书《周易》译本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本帛书《周易》的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弼的《周易注》，他在对《周易》文本注疏进行历史角度考察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将《周易》简单笼统地看成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智慧之书，而把它看成特定时代和地点的历史文本。³由苏德恺（Kidder Smith）、包弼德（Jr. Peter K. Bol）、艾周思（Joseph A. Adler）和怀亚特（Don J. Wyatt）合作完成的《宋代易学》试图通过考察宋代的易学研究与接受，理解《周易》文本与时代政局、思想变易之间的交

互发明，在对宋代知识分子的易学思想面貌进行整体勾勒的同时，呈现宋代思想史的一个特殊面向。⁴而哥本哈根大学的尼尔森（Bent Nielsen）教授则是通过《〈周易〉“数学”与“宇宙学”手册：从汉代到宋代的中国象数易学》的编撰，将“象数”易学的独立性凸显出来，达到对《周易》文本的历史性理解。⁵韩子奇（Tze-ki Hon）的《〈周易〉与中国政治：北宋时期的经典诠释与士人的行动主义》则是在政治与易学诠释之间的建立起历史的关联。⁶还有学者通过《周易》的海外传播，从而达到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和文化的认识（《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思想和文化中的〈周易〉》）。⁷

人们借助出土文献、不同时期不同的文本诠释，将《周易》这样一个多层累的文本逐渐还原到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中。因此一些易学的基本问题，如创作年代、文本构成、具体的文辞解释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特定文

1 Nielsen, Bent: *A Companion to Yi jing Numerology and Cosmology: Chinese Studies of Images and Numbers from Han to Song*, London, New York, etc.: Routledge-Curzon, 2003. P.vxi.

2 Iulian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tran. By William L. MacDonald, Tsuyoshi Hasegawa, Hellmut Wilhel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3 Richard John Lyn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Smith, Kidder, Jr., Peter K. Bol, Jpseph A. Adler, and Don 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Nielsen, Bent: *A Companion to Yi jing Numerology and Cosmology: Chinese Studies of Images and Numbers from Han to Song*, London, New York, etc.: Routledge-Curzon, 2003.

6 Tze-ki Hon: *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7 Wai-ming Ng: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0.

本(如《易传》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研究)、特定时期特定作者的注疏(诠释)的研究(如《周易王弼注》、朱熹《易学启蒙》、《程氏易传》等)、特定的易学流派的研究(汉代象数易学研究、宋代易学)都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其共同特征主要有三点:(1)强调《周易》文本的层累和内部差异;(2)强调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区分;(3)强调《周易》的历史诠释与特定时代的紧密关联,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潮下研究《周易》,通过《周易》的历史诠释来理解时代的面貌。

此外,在海外的易学研究中,有一类可以称为易学比较研究,或者比较易学研究。研究者大多带有中国文化背景,身处于“文化间际”的境遇之中,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带着跨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研究《周易》,或究其不同,或彰其差异,因其研究主要是在西方尤其是英语学界的学术生产体制之中,暂且将之归于西方易

学之部分。例如唐力权(Lik Kuen Tong)和顾林玉(Linyu Gu)将怀特海与《周易》进行了比较研究。¹成中英在《孔子、海德格尔和〈易经〉哲学:对于人类存在真理的比较探讨》²则在时间这一关联点上将海德格尔与《周易》进行比较,同时他还试图将《周易》的时位观念与现代管理学的理论联系起来,如《〈周易〉位与时的现代意义及C理论的发展》³,其创立的《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也成为中西方哲学尤其是《周易》研究的学人们进行学术探讨的重要平台。这一路径的研究大多旨在凸显中国哲学文化在世界哲学文化语境中之独立性,以及寻求对话的可能。

结论:作为西方学术的《周易》研究

诚然,在以上三种主要的研究路径之外还存在着其它笔者未涉及到的

路径,譬如结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易”路径等,⁴都暂且不列入讨论的范围。三种路径并非截然对立,也不是完全平行,而是一个交错的网状结构,且每种路径本身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分化之中。截取这几种路径,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纠结。因为类的划分总是意味着将丰富性在某些角度上忽略,在某种程度上与本然的状态产生一定的隔膜。笔者将其划分为几种路径,并不意味着可以理直气壮将西方的易学研究按照自己的“前理解”贴上标签,让他们在自己看来都有几分莫名其妙的分类上站队。然而为了获得大体清晰的轮廓,队还是必须站的,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队形,仅仅是观察西方易学研究史的一种角度。只有在各种队形的变换和相互参照之下,才有可能最终获得相对可靠的理解,也只有在这种试图接近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对西方易学研究史的理解才被丰富起来。

1 Lik Kuen Tong: *The Concept of Time in Whitehead and the I 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 Nos3/4, (Dordrecht/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382.

Linyu Gu: *Time as Emotion versus Time as Moralization: Whitehead and the Yij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5, no.2 (1998): 209-236.

2 Chung-ying Cheng: *Confucius, Heidegg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hing: A Comparative Inquiry into the Truth of Human Being*,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7, No. 1 (Jan., 1987), pp. 51-70.

3 成中英:《〈周易〉位与时的现代意义及C理论的发展》,《易学本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或参见:《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台北:东大书局,1995年。

4 某种程度上而言,国内《周易》研究中的“科学易”主要来自西方的鼓舞。西方学者在他们对《周易》略有了解之后,便惊讶19世纪和20世纪重大的科学发现原来在《周易》中有着惊人契合,这极大的煽动了国人对于祖宗文化遗产的自豪感。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影响,毋宁说是一种印证而已。那些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二进制、量子力学、DNA等与其说是《周易》启发了他们,不如说他们重新发现了《周易》。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从传教士白晋处得到邵雍的卦序图,发现其与二进制之间的惊人相似。李约瑟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涉及到《周易》相关问题。另外德国学者马丁·肖恩贝格(Martin Schönberger)1973年在慕尼黑出版了《生命之迷锁:〈周易〉生命起源的宇宙模式》,该书1979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本。此类著作还有如《周易与DNA:生命之道》等。另外还有关注《周易》与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

新西兰南亚研究中心¹

新西兰将南亚视为经济合作伙伴及政治影响力逐步上升的地区。位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新西兰南亚研究中心(NZSAC),旨在增进新西兰人对南亚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尤其是经济、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发展



现状)及挑战的了解。中心注重培育与境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关系,并为学者、学生、政界人士、商界人士提供合作研究平台及教育咨询服务。中心每年举办若干次午餐会、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研讨会,并不定期地邀请印度艺术家带来极具印度风情的歌舞表演。

中心的研究人员由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化研究及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组成。Jane Marion Buckingham 负责学术研究联络事宜,她对南亚历史尤其是印度殖民地时期的医疗史很有研究;Arindam Basu 博士的关注点则是近40年来印度的医疗卫生事业与健康政策;Dorothy Mc-Menamin 的研究侧重于当代南亚历史与宗教;Aditya Malik 探讨印度教中的文化叙事;Elain Dobson 的兴趣在于南亚音乐;Peshmi Roy 从事后殖

民研究与文化研究;Baljit kauri 热衷于与青少年教育相关的历史与文化研究;Venkatarama Nilakant 擅于研究印度管理理念与方式的变革;Clemency Montelle 关心的是自然科学在南亚的引介及传播;Pirers Locke 从人类学视角研究南亚的驯象史。

中心的南亚研究项目(SAST)针对本科生开设了一系列选修课程,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将了解南亚地区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文化、宗教与国家建制的多样性;从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化研究的视角,研究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南亚;认识南亚在亚太地区经济与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南亚的成长所具有的全球性意义;留意新西兰与南亚关系变化轨迹。在修满南亚研究项目开设的课程之后,仍有兴趣致力于南亚研究的学生,可以申请研究生奖学金。此外,已经获得南亚研究相关学位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也可通过与中心的南亚研究专家合作研究项目申请奖学金。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¹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4日。



怀着一颗心去，带着一份情回

——赴韩访学一年后记

姚胜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2010年8月底，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我们来自东亚地区六个国家的50余位学者齐聚韩国，在各自的访问学校开始了一年的研究生活。

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财团给予了很多关心与帮助。一些学者抵达首尔时，尚未落实住处，财团安排志愿者忙前跑后，出入各种“不动产”，帮着看房、租房甚至砍价，事无巨细，服务周到。抵达首尔的第三天，十五年一遇的超强台风从首尔上空横扫而过，狂风乱作，大雨倾盆，让很多来自内陆的学者第一次经历了台风，也感受了韩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

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财团安排了韩语学习课程，组织了多次文化体验活动。我们在首尔市内游览了汉江

夜景，亲手腌渍了韩国泡菜，寻访了新罗古都庆州、百济故地扶余、东国儒学发源地安东、荣州以及众多名寺宗刹，领略了釜山细腻的海滩与突兀的石崖，攀登了雪后的长白山和巍峨的雪岳山，体验了SK集团的高科技、能源基地和反馈自然的SK森林。

学者们在从事研究工作之余，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展开了许多观察、体验韩国社会的活动。不少人游历各地，遍访名山，参观民俗表演与节日祭典，参观文化教育机构与公共设施，考察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可以说，我们不仅仅是借一块宝地开展研究，更是在观察韩国，体验韩国，品味韩国。然而，这种深入细致的观察尚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因为我们来

自别国，我们是“外国人”。

一般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从历史来看，目前的东亚，却似乎是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西学东渐以前，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蒙古高原、中南半岛、琉球、日本在内的广袤地区，已经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的共同体。尤其是当时的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政治制度，紧密的经贸往来，共通的书写系统，以及近似的生活方式。两国之间有边疆而无边界，出入有关防而无边检，人民往来频繁，商旅不绝于道。

唐代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但其东端并未止步于长安，其余续远及新罗庆州。堪称“东国儒宗”的新罗人崔致远前往唐朝参加科举、入仕为官，在中国生活工作十六年之后又返回新罗为官，著有《桂苑笔耕集》传世。同是新罗人的金乔觉来到安徽九华山参悟佛法七十余年，被中国人尊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受万世敬仰。明清两朝，朝鲜来华使团络绎不绝，人数不可胜数。公务之余，他们与中国官员、学者接触，采访民间，流连书肆，游览名胜。使团人员将其在华所见所闻著录成书，文字各有多寡，统称为《燕行录》。其中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当属崔溥的《漂海录》与朴趾源的《热河日记》。

然而这种往来无间的状况在近代被打破，随着西方与日本的侵略，两国均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奋起反抗的同时，两国民族意识也随之觉醒。“二战”之后，西方消弭了“主权隔阂”，



在西欧成立了欧共体，后来发展为欧盟；在北美，美、加、墨也在推进一体化。然而此时的东亚，却刚刚在西方主权理论的大旗下，建立了各个民族国家。中韩两国重获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同时，却也付出了两国人民日渐陌生与疏离的代价。一位韩国朋友曾经问我：“韩中历史是不是很复杂？”我回答说：“的确很复杂。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我们在用西方人的理论看待我们东方人的历史。”用鱼类的生理解剖图去分析飞鸟，岂有不复杂之理？

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各国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除了政府推动之外，民间有识之士也开始了文化与学术的交流。为了推动亚洲学术

发展、增进相互理解，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自2000年始，启动了“国际学术交流资助”项目，邀请亚洲各国年轻的优秀的学者到韩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与韩国学者一起开展合作研究。这也是我们六个国家五十余位学人得以在韩国相聚的原因。截至今日，我们这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也已启程。相信下一届学人必将同我们一样，怀着了一颗心去，带着一份情回。

财团讲义室里有幅字，是朝鲜时代的“时令小调”。诗虽简短，但意义深远直入人心，特抄录于此：

태산이 높다 하되 하늘 아래 메이로다.

오르고 또 오르면 못 오를 리 없건마는

사람이 제 아니 오르고 메만 높다 하더라.

试着翻译，大意如下：

泰山虽高，但也只是天空之下的山。

只要一次又一次地登攀，没有上不去的道理，

然而，人们却说：我不登山只因山太高远。

中国也有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两国和东亚人民相互交流做一点事情，虽然我们人微言轻力薄，但也应当持之以恒。世间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